

翁同龢与

严虞惇、钱廷锦手批苏诗

■ 樊庆彦

摘要: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严虞惇、钱廷锦手批《东坡先生诗集注》三十二卷,此前曾先后为翁同龢、黄裳所收藏。严、钱二人均多次评点苏诗,用力颇深,精见迭出,从中亦可见出二人诗学之异同。翁、黄二人对此批本并多所题跋,不仅可以据此梳理评本之流传,也可管窥翁氏之内心活动及时代政治变幻。因而此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与文献史料价值。

关键词:王注苏诗 手批本 严虞惇 钱廷锦 翁同龢

DOI:10.16093/j.cnki.ccc.2016.02.006

一

清代严虞惇、钱廷锦手批《东坡先生诗集注》三十二卷,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评本所用底本为宋王十朋集注、明王永积刻本。卷首大题次行署“宋眉山苏轼子瞻著”,又次双行题“宋永嘉王十朋龟龄纂集,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”。半叶十行,行二十一字。白口,单边。首卷前有王十朋序及西蜀赵夔尧卿序,次百家分注姓氏,次目录,次东坡纪年录。书前卷尾附有多则题跋,书中钤有多枚藏书印章,据此可以梳理出评本流传之过程。

评本卷首大题下朱笔曰:“丁丑春,钱简臣阅。”目录后有墨笔曰:“光绪庚子四月朔,邑子翁同龢获观。”(下钤“龢”字朱文方印)首叶书眉紫笔题:“紫笔临严思庵先生手批本,同龢记。”(下钤“叔平”朱文小方印)卷尾有黄笔题曰:“丁丑初夏,后学钱廷锦简臣阅一过。”又墨笔题曰:“雍正九年十一月,钱廷锦点阅一过。十五日病起,寒窗记。时六十有五岁。”评本中并有“宝姿

室”(朱文长印)、“虞山翁同龢印”(白文方印)等图章,卷尾又有翁同龢题识曰:

光绪庚子首夏,得此书于邑中书估,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,丹黄烂然,颇极矜慎。是年六月,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,前后数过,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,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。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,而手眼各别,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,并圈点于册内,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。(上钤“庚寅生”朱文小长印)

由此可知,此本曾经虞山钱廷锦(简臣)评阅。“丁丑”应为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他首次批阅苏诗年方三十岁。雍正九年为1731年,钱氏“时六十有五岁”,又“点阅一过”。钱廷锦两次评点苏诗,前后相距三十五年之久,分别以朱、黄两色区分之,“丹黄烂然”。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(“庚子首夏”“四月朔”),此批本被翁同龢从家乡书肆中获藏,他又于是年六月获得了其“帝党”好友汪鸣銮(柳门)寄赠的严虞惇

作者简介:樊庆彦,文学博士,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文论与文献。

基金项目: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一般项目《苏轼诗文评点研究》(编号:14CWJ20)的阶段性成果。

(思庵)的苏诗批本。严虞惇曾在批本上記曰：“庚辰六月十五日，阅完苏诗三十二卷，贫病交迫，朝不谋夕，草草读过，未细咀嚼也。”依语意观之，这似是严氏第一次批点苏诗，应为康熙四十四年(1701)，略晚于钱廷锦首次批阅苏诗。翁氏说他“前后数过”，最后一次批点在康熙五十年辛卯(1711)，比钱廷锦第二次手批苏诗要早二十年之久。翁同龢将严氏批语用紫笔过录到钱氏批本之上，以便于比较两人诗学之异同，这也使得此手批本蕴含了丰富的理论批评价值。

评本中亦钤有“黄裳藏本”“黄裳珍藏丛本”“黄裳容氏藏图籍”等书章，可知该评本在收入国家图书馆之前，还曾为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(原名容鼎昌：1919—2012)所收藏。黄裳先生在《翁批东坡先生诗》一文中提到：“余得此本于庚寅前后。”^①而在此苏诗评本中他亦曾记曰：“此明刻本，颇后印。翁同龢放归故里后所读书也。身后与他种遗藏流落沪市，见于萃古斋。”从而于“庚寅(1950)正月廿四日海上收”之。

黄裳先生还于另一明茅维刻本的王注苏诗评本中多次题识曰：

余旧藏王注苏诗，与此板刻正同。茅维一行则属“明梁溪王永积崇严阅”，盖取此本书板挖补重印者。经钱简臣评阅，更得翁同龢过录严思庵评，甚珍视之。近拟斥去，不无怅惋。会于传薪所获群书中得此本，初印精好，胜于翁本，卷中有黄笔批校，遂以廉直获之。更抽暇过录严批及同龢手跋，当重装之，以存遗迹。此本卷十一至十四系用明刊别本配补。此书不罕见，它日更遇，当抽换之。辛卯春三月廿六日。

……

松禅(笔者按：翁同龢号。)于此书用力甚幼，更有跋语数篇……原书早已散去，笔

录尚存。因移写之。辛卯秋日。

……

此物常熟手迹，严思庵手评苏诗跋尾，原书早经易去。忆卷尾更有翁氏手跋数通，为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。闻京警而思中朝，其意可伤。曾于藏书簿录中著之，它日当别为辑成一卷，并思庵所为小跋入藏书记中。……黄裳记。

此茅维刻本并非为翁同龢所藏原本，乃是黄裳先生辛卯年(1951)所新获藏本，而黄裳先生又将翁氏“戊戌党狱之后放归思过时所作”，“不意于跋尾中昌言无忌”，“吐露罪臣心事”的题识跋语过录保存下来。不过总而言之，严、钱二人的手批本能够为翁、黄两大收藏家所青睐，且多所题跋，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。

二

严虞惇(1650—1713)字宝成，号思庵居士，江苏常熟虞山人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)举一甲二名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后曾任太仆寺少卿。“其学根柢经史，贯穿三通之书，有《读诗质疑》三十一卷。著述甚富，为文典实正大”^②。严虞惇读书能够常年坚持不懈，极有恒心，几乎是每日必阅，且反复批校，仔细体会，颇似读书日记，此即其所谓“日课读书法”。尤其是对于家传元刊本《资治通鉴》，根据他批阅此书的题跋时间可知，自康熙十五年至他去世前三年即康熙四十九年，其间“于此书凡经六七阅”^③。同样，严虞惇于“庚辰(1700)六月十五日阅完苏诗三十二卷”，“前后数过，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(1711)”，也是运用了十年之功，既见其读书持心之恒，亦见其对苏诗用情之深。

严虞惇批点苏诗而致力颇深，还与其性格特征、个人遭际及苏轼的魅力影响不无关系。

① 黄裳《来燕榭读书丛札(续)》，《东方早报》2012年2月12日，第B04版。

② [清]冯桂芬《(同治)苏州府志》卷一百，清光绪九年刊本。

③ 瞿士良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页57。

严虞惇为官清廉,秉公执法,但“己卯(1699),科场狱兴,宝成子侄皆中选,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,用是置吏议,镌秩归”^①。严虞惇因子侄和好友牵连,革职闲居,隐家数年,批阅诗文,遣忧抒怀。翁同龢曾在此苏诗评本后手跋一叶曰:“思庵先生,古之狷者也。其罢官居京师时,至于绝粮。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。非其人必不受也。”宦海沉浮,仕途坎坷,“贫病交迫,朝不谋夕”之际,使严氏对苏轼的生平遭遇感同身受,对苏诗中的兄弟深情、朋友真情体会尤深,时常目为知音。如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》评之曰:“真情苦语,令我心恻。”《和子由苦寒见寄》“吾从天下士,莫如与子欢”句评曰:“千古兄弟之乐,无过二苏矣。万钟之富、三公之贵,岂足易此哉。”其评《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》首句“我年二十无朋俦,当时四海一子由”曰:“千古友朋兄弟之乐,读此二语,为之慨然。”对于苏轼所流露出来的不平之怨也是予以理解和同情,如《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》云:“故人千钟禄,馭吏醉吐茵。那知我与子,坐作寒蛩呻。”严氏评曰:“东坡亦望故人分惠耶?何其不旷也。”而《十月一日将至涡口五里所遇风留宿》一诗,更使他引为同调,发为感慨:“余自成都入舟,至今已四十余日,至今未尝遇一顺风也。此行垂索而归意者,鬼神欺我穷乎?其亦戏我乎?吾愿鬼神之勿为害也。”由此他甚为推崇苏轼的人格品行,如《和钱安道寄惠建茶》评曰:“余《试蜀发策》极推坡公,立朝气节正谓此也。”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”句,评之曰:“每读公诗至快心处,真令人有弃妻子如脱履之想。”《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》评曰:“精言可味,吾辈立身亦犹是矣。”

严虞惇对苏轼的诗才亦是赞赏有加,如《次韵章传道喜雨(禱常山而得)》评之曰:“次韵如自己出,惟坡公能之,真是才大于海。”《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》评曰:“此等和韵诗,真正才大如海。”“十二句连用六人,古无此体,惟公才大,无所不可。”评《两桥诗(并引)》

曰:“二诗同一韵,皆极自然,惟先生有此笔力。”尤为可贵的是严虞惇能够以文学因革正变的学术眼光看待苏诗,不仅注意到苏诗在艺术上对于前人尤其是对杜甫的继承,如评《南康望湖亭(一本云过洞庭)》:“此种五律是学杜。”《中隐堂诗(并叙)》评曰:“此五篇拟杜《何将军山林》诗也。”《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二首次韵》评曰:“东坡五律,诗味极似老杜。”《和孙叔静兄弟李端叔唱和》评曰:“似杜。”他也看到了苏轼善于开拓和求变的一面,如《入峡》评之曰:“长律如散文,子瞻独创。”能够在传承中创新,这也是苏诗能够长存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严氏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高屋建瓴地审视苏诗,对其利弊得失有着清醒的认识,也指出了由此而带来的弊病。如他评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》曰:“唐人五言诗多用古韵,七言诗专用本韵,读韩、杜集可见也。至宋人则七言亦用古韵矣。古韵有可通,有不可通。如此诗,‘兀’‘发’‘没’‘忽’,月韵也;‘寔’,药韵也;‘恻’,职韵;‘瑟’,质韵也。古韵惟‘质’‘月’通用,余皆不可通。盖用韵之错乱,自坡公始矣。”

宋人尚议论,苏轼也喜好以文为诗,纵放恣肆,直抒胸臆,议论英发,但有时以抽象议论代替形象表达,过于直露率易,忽略了诗须凝练含蓄的内在特质。严虞惇亦直陈利弊,有所针砭。如其评《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》“不作雍容倾座上,翻成肮脏倚门旁”曰“句无谓”。评《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》“牵衣男女绕太白,扇枕郎君烦阿香”曰“二句未工”。评《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第二首》“杀马毁车从此逝”句曰“何必如此,亦太过”。评《浴日亭(在南海庙前)》“剑气峥嵘夜插天”曰“首句似俗”,“遥想钱塘涌雪山”句“凑入无谓”。评《次韵张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别》“樊口凄凉已陈迹”与“江湖前日真成梦”两句“犯重”。等等。当然,这与苏轼公务繁忙或交游广、应酬多而消耗才思,致使作品不够精致也不无关系。这些评语都较为准确地指出了苏诗的受病之处,体现出严虞

① [清]李元度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四十《文苑》,岳麓书社,1991年,页1091。

惇犀利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文学修养。

三

钱廷锦,生平事略未详,翁同龢在苏诗评本题识中仅提到他较严虞惇稍晚:“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。”据此评本钱氏题跋曰:“雍正九年十一月钱廷锦点阅一过。十五日病起,寒窗记。时六十有五岁。”可知钱氏应生于康熙六年(1667),比严氏小十七岁。另查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可知,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明刻本《唐陆宣公集》二十二卷,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刻《白氏长庆集》七十一卷,曾有清钱廷锦批校、题跋^①。如果我们观其所记,便会发现,钱廷锦也是受到了清代“日课”之风的影响,在读书的时候反复批阅,不止一过。如他在《白氏长庆集》后墨笔题曰:“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,后学钱廷锦病中从宋刻将乐天全集教阅讫。其诗别有松圆诗老、园沙居士及各家诗人阅本,另录在汪氏诗刻。时年五十有九。”又朱笔题曰:“雍正九年二月初七,廷锦点阅一次。时年六十有五。右臂已废,不能作字。”由前文得知,钱廷锦也曾先后于康熙三十六年和雍正九年两次评点苏诗,并分别以朱、黄两色区分之,虽然前后相距三十五年之久,但评点风格、观点基本一致,可作统一观之。

钱廷锦的苏诗评点侧重给读者提供背景材料,较为简洁平淡。如其评《游东西岩》曰:“一篇自况。”《王维吴道子画》“吾观二子皆神俊,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”句评曰:“重王诗,故独进王画。”《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》“爱此山中人,缥缈如仙子”句评曰:“也要还他山亭可爱处。”《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》首句:“草没河堤雨暗村,寺藏修竹不知门。”钱氏评曰:“即合夜宿。”《祥符寺九曲观灯》前四句云:“纱笼擎烛迎门入,银叶烧

香见客邀。金鼎转丹光吐夜,宝珠穿蚁闹连宵。”钱氏评曰:“‘擎烛’九曲。”言简意赅,点到即止,却又利于读者理解。

不惟如此,钱廷锦对苏诗艺术的评点也多是一些短截有力的字句。如他比较关注苏诗的用字法,《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》“岩头匹练兼天净,泉底真珠溅客忙”句,其评之曰:“‘溅’字尤胜。”《次韵沈长官三首》“风来震泽帆初饱,雨入松江水渐肥”句,其评之曰:“以‘饱’字脱出‘肥’字,更妙。”评《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·待站台》曰:“做‘待’字妙。”他同样关注对苏诗章法、句法的分析,其评《新城道中二首(其二)》首联“身世悠悠我此行,溪边委辔听溪声”曰:“迭前韵,起手便舍下,妙。”评《铁拄杖》“含簧腹中细泉语,迸火石上飞星裂”句曰“炼句”;“披榛觅药采芝菌,刺虎纵蛟搗蛇蝎”句曰“奇警”等等。但是钱廷锦也屡屡指出苏诗“太露”“未工”“恶俗”“轻脱”“乏趣”等受病之处,显示出评者精湛的文字功底和高超的艺术水平。

钱氏评点还喜欢就苏诗材料加以考辨。元明以来,托名王十朋的苏诗分类注本孤行海内,“几于家有其书”。但此本经茅芑加以删改后,屡屡出现“分门别类失之陋,不著书名失之疏,增改旧文失之妄”^②。钱廷锦对于文字之是正、真伪之辨订,也是苏诗之功臣。如《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》诗中,王注本作“寒更报新霁,皎日悬半破”。施注本则将“日”改作“月”。对此,钱氏考辨曰:“‘日’如何‘半破’?若谓是‘日出雪消’,语亦生涩不醒。施注作‘皎月’为是。”又如王注本将《虎儿》《庞公》归入《咏史》类中,对此他指出:“远乃子由之子,小字虎儿。此诗不应编入《咏史》集中。”《庞公》“诗意皆公自寓,编入《咏史》,非也”。他还认为,《游净居寺》“刑名非夙学,陷

^①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集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页98、142。另湖北省图书馆所藏明崇祯元年刻本《陆宣公全集二十四卷》,系慈溪耕餘楼旧藏,由明汤宾尹评点,亦有清雍正三年钱廷锦朱笔批校题识。参见阳海清、刘烈学《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〉未收书八种》,《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》2000年第2期,页55。

^② [清]邵长蘅《施注苏诗·注苏例言》,《施注苏诗》卷首,清康熙三十八年宋率宛委堂刻本。

阱损积威”句，王注本“今以‘威约’连读，非是”。并且指摘《次韵许遵》一诗王注“非也，公诗文拟借极多，不可拘泥”。这些对于苏诗版本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但钱廷锦尤为关注的还是对于苏诗的渊源考订。《颍州初别子由二首》“咫尺不相见，实与千里同。人生无离别，谁知恩爱重”句，钱氏评曰：“绝似太白。”《吉祥寺赏牡丹》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”句，钱氏评曰：“本刘禹锡诗。”其评《九日湖上寻周李二君不见君亦见寻于湖上以诗见寄明日乃次其韵》曰：“兼苏州、太白之长。”《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》“诗人老去莺莺在，公子归来燕燕忙”句，钱氏认为其源于杜牧之诗：“绿树莺莺语，平江燕燕舍。”《西斋》“鸣鸠得美荫，困立忘飞翔”句“似韦（应物）。”《芙蓉城》“飘然而来谁使令，皎如明月入窗棂”句“暗用李夫人《帐中词》”。其评《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》曰：“感慨历落，有唐人风致。”评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曰：“其用意之深，层次之细，不减李义山《雪》诗二首。”评《寄刘孝叔》曰：“新法之弊，尽于此诗，是亦杜陵之诗史。”评《雨中过舒教授》曰：“似柳州。”评《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遁小名千儿……作二诗哭之》曰：“真似乐天。”评《虢国夫人夜游图》曰：“夜游似少陵写。”综而观之，钱氏多瞩目于其与唐人之间的传承。

苏轼对于丰富的文学遗产既有继承，同时又加以改造、发展，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色。钱廷锦在指出苏诗与唐诗的艺术渊源的同时，亦能对苏诗新变与开拓的一面有充分的认识。如其评《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》曰：“此公诗之所以独绝，不可以常格议也。”评《次韵孙职方苍梧山》“或云灵境归贤者，又恐神功亦偶然”句曰：“此等诗调，自公开之矣。”评《铁拄杖》曰：“便似老杜，而一种奔轶之气，自是公本色。”出于对苏轼的敬仰崇拜及其作品的激赏，其诗文经常被人奉为创作的圭臬，钱廷锦也指出了苏

诗对后人的影响。如其评《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》“乱山横翠嶂，落月淡孤灯”句曰：“范石湖‘山根炬火忽人家’本此。”评《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》曰：“此种乃放翁所宗仰。”评《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》“多事始知田舍好，凶年偏觉野蔬香”句曰：“阮白最赏此连（联）。”《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》“探怀出新诗，秀语夺山绿”句，其评之曰：“昔圣阶枉赠予诗云：‘烹茶诵君文，秀夺南山绿。’盖用公句也。”体现出他通观古今的文学史视野。

四

翁同龢（1830—1904），咸丰六年（1856）状元，诗、文、词各体兼擅，以诗最工，足名一家。他受同乡钱谦益的影响也最大，钱谦益探花及第却仕途坎坷，屡被放黜，翁同龢亦感同身受，当然他更为钱氏才学淹博所折服，推重其“根抵盘深”。翁氏之诗亦是抒情议论熔铸一体，邵松年认为其诗“宏深淹博，笔有奇气，多与苏公相类”，为一时斯文宗主^①。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对其诗有“风骨道上，余事作诗人，非学裕识广，辟易千人者，固未足语于此”之评^②。亦可见出翁氏之诗与东坡、牧斋诗歌风格的相近之处，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苏诗及虞山诗人缘何喜爱有加了。

翁同龢于此苏诗评本题识曰，严虞惇与钱廷锦二人“手眼各别”，故将二人评点会为一处，“以证吾虞诗派之异同”。严、钱、翁三人皆为虞山乡里，而虞山诗派是明清之际东南诗坛的重要流派。若论文学流派之形成，“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，后有振起之魁杰，而后始克成为流别，于以永传”^③。虞山诗派以钱谦益为开创者，而以钱氏之门生冯舒、冯班、瞿式耜，及族孙钱曾、钱陆灿等阐扬其风。钱谦益之诗虽初学盛唐，却又能够别开生面，敢于挑战“独尊盛唐”这一强势理论的传统地位，认为宋诗在中晚唐

① 邵松年《瓶庐诗补序》，见《翁同龢诗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页443。

② 钱仲联《清诗纪事》（十六）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页11312。

③ [清]王葆心《古文辞通义》卷六《识涂篇·二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页210。

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,“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”^①,其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家,转益多师,相容并蓄,不拘一格。其弟子瞿式耜认为:“先生之诗,以杜、韩为宗,而出入于香山、樊川、松陵,以迨东坡、放翁、遗山诸家。”^②王士禛《分甘余话》云:“虞山源于少陵,时与苏近。”^③计东《梅村诗钞题词》曰:“虞山暮年之诗,心摹手追于眉山、剑南之间。”^④严虞惇在评点苏诗《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》中亦指出:“钱牧斋《有学集》中诗,造此境界。”钱氏才学兼资,藻思洋溢。他一面倡“情真”“情至”以反对模拟,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。其诗文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,合“学人之文”与“文人之文”为一体,纵横曲折,奔放恣肆,规模宏大,振作了明末清初的文风。

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,虞山诗派一脉持续不断,绵延发展。王应奎在《西桥小集序》中申论曰:“吾郡诗学,首重虞山,钱蒙叟倡于前,冯钝吟振于后,盖彬彬乎称盛矣。”^⑤二冯(冯舒、冯班)在很大程度上自觉继承了钱谦益的文学观,反对明代复古派一味标举“盛唐”、回归“李杜”的狭隘取径,力破余地,追求“真诗境”。但虞山诗派在诗学理念和审美取向上并未完全一致,单学傅《海虞诗话》谓:“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,冯定远主法,后学各有所宗。”^⑥对于如何汲取新的诗学之源,冯氏虽然同样反对专以盛唐为宗,但也不以牧斋导扬宋诗为然,而是尊崇晚唐杜、李、温等诸人,且根系远及六朝。

钱谦益在《冯定远诗序》中即指出:“其为诗沉酣六代,出入于义山、牧之、庭筠之间。”^⑦他在《冯己苍诗序》中也赞赏冯舒“枕经籍史,肆志千古。其为学尤专于诗,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,编削伪谬。一言之错互,一字之异同,必进而抉其遁隐,辨其根核”^⑧。事实上,变异是诗派发展的动力,也是诗派具有活性的标志。二冯自《诗经》以下逐一考订渊源,功力深厚,而冯班之诗尤为沉丽细密,锤炼藻绘,以标榜玉溪生而自张一军,势力日渐壮大,使虞山派“诗坛旗鼓,遂凌中原而雄一代”^⑨。康熙二十五年(1696)曹禾撰《海粟集序》曰:“虞山之前辈曰宗伯钱先生,其论诗也苛,其自为言也足,门墙士多从冯氏学在乡邦。”^⑩而沈德潜则曰:“湘灵为牧斋族子,然其诗不为虞山派所缚,别调独弹,戛戛自异,毗陵学诗者多宗之。”^⑪钱陆灿学富才高,他尊崇钱谦益,反对冯班“以妖冶为温柔,堆砌为敦厚”的诗论,所著诗词骨力雄厚。王应奎认为:“湘灵诗宗少陵,有高旷之思,有沉雄之调,而其教人也,亦必以少陵。”^⑫故而,虞山诗派在钱谦益身后已分立门户。台湾学者胡幼峰先生在《清初虞山派诗论》一书中,以王应奎编纂《海虞诗苑》为据,参考沈德潜选辑《国朝诗别裁集》和王豫编选《江苏诗征》,列举了近四十人为虞山诗派成员^⑬,其中分以钱谦益、冯班为先后宗主,将冯舒、钱曾、钱陆灿、严熊、钱良择、王誉昌、王应奎称为虞山派重要诗人,又列有“宗

① [清]钱谦益《牧斋外集》卷二五《雪堂选集题辞》,《绛云楼题跋》,中华书局,1958年,页176。

② [清]瞿式耜《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》,[清]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卷首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。

③ 钱仲联《清诗纪事》(三)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87年,页1259。

④ 钱仲联《清诗纪事》(三),页1412。

⑤ [清]王应奎《柳南文钞》卷五,清乾隆刻本。

⑥ [清]单学傅《海虞诗话》卷二,民国四年铜华馆本。

⑦ [清]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卷三二,页939。

⑧ [清]钱谦益《牧斋初学集》卷四十,页1086—1087。

⑨ [清]陈祖范《海虞诗苑序》,[清]王应奎《海虞诗苑》卷首,古处堂刊本。

⑩ [清]曹禾《海粟集序》,[清]顾复渊《海粟集》卷首,清雍正八年刊本。

⑪ [清]沈德潜等《清诗别裁集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页167。

⑫ [清]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卷五,中华书局,1983年,页88。

⑬ 参见胡幼峰《清初虞山派诗论》,台湾“国立编译馆”,1994年,页326—363。

钱”“宗冯”“出入钱冯”三派和“后期弟子”数人，而“宗钱”派中即有严虞惇。

如果观照严虞惇所批苏诗，其宗法杜甫，倡“情真”，抑空疏，求创新，反摹拟，文风奔放恣肆，具有直面现实、心系国运、关怀人生的诗史意识。他称赏苏轼之才学，如前述其评《次韵章传道喜雨（祷常山而得）》曰：“次韵如自己出，惟坡公能之，真是才大于海。”《正辅既见和复次前韵慰鼓盆劝学佛》评之曰：“此等和韵诗，真正才大如海。”但对于苏轼学习六朝之诗却颇有微词，如其评《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……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》曰：“此诗仿潘岳《西征赋》体也。○对仗未甚工，叙事详略亦未妥，盖非公诗之佳者。”可见其所受钱谦益诗学之影响。反观钱廷锦所批苏诗，亦能够肯定苏轼的转益多师，尤其是在苏诗与唐诗之因缘问题上，与严虞惇颇有一致之处，但其态度认真谨慎，温柔敦厚，信而有征，简洁细密，注重作品的历史背景材料，瞩目苏诗的本事源流考订，等等，却似与冯班诗论大体相合。同样是《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……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》一诗，其认为此诗不修边幅，缺乏内蕴之美，故讽之曰：“起结叙致，不衫不履，自是宋体。”但这在“粗疏任气”，“宏深淹博，笔有奇气”，深受钱谦益影响的翁同龢看来，的确是“评点极矜慎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”。因此，诚如翁同龢所言，通过对比严、钱两人的苏诗评点，亦可见出虞山诗派演变之路径及诗人之宗尚，对于清代文学批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五

黄裳先生不仅收藏过录了翁同龢的苏诗评本题跋，还在其《来燕榭读书丛札（续）·翁批东坡先生诗》中深入分析了翁氏由此评本题跋中

透露出来的内心活动，借此亦可管窥当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。

翁同龢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官至协办大学士，累迁户部、刑部、工部尚书，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先后担任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，堪称“帝党”魁首。在光绪时期，翁同龢不仅参与了中俄、中法条约的决策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也是主战最力，对抗李鸿章等主和派，被奉为“清流”宗主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翁同龢柄国，“痛于甲午之役，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，破格求贤，冀匡时变，惜望治过急，荐举非人”^①。所依靠结交者罕有地方封疆大吏，多是词垣台谏、翰林“清流”，无实力权柄，议论朝政振振有词，慷慨激昂，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。而且翁氏“久侍讲帷，参机务，遇事专断。与左右时有争执，群责怙权”^②。因此作为“帝党”的领袖，翁同龢率领的力量看似羽翼众多，其实十分脆弱松散，在与“后党”的斗争中一击即溃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四月，变法尚未开始，翁同龢便因“近来办事多不允协，以致众论不服，屡经有人参奏。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，任意可否，喜怒见于词色，渐露揽权狂悖情状，断难胜枢机之任”，被“开缺回籍，以示保全”。变法失败后，又被扣上了“辅导无方，往往巧藉事端，刺探朕意”，“办理诸务，种种乖谬，以致不可收拾”的罪名，终获“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^③。

翁同龢作为清廷重臣，为官多载，却极清廉，回乡后无所依傍：“叹息无家老逐臣，只余两膝挂孤身。”^④其曾于苏诗评本后亦自叹曰：“余削籍归田，生计日迫”，以致竟要靠门生故旧接济，借住在亲戚家中：“自十六以后无雨，几于流金烁石矣。余假菴卿侄舍以居，书室如斗，蚊雷轰然。临圈点毕，因记。六月廿九日。”落魄忧伤之情俨然可见。因而对严虞惇“罢官居京师

① [清]国史馆《清史列传》第六十三册，卷六三《已纂未进大臣传》二。中华书局，1928年影印本，页114。

② [清]赵尔巽《清史稿》卷四三六《列传》二二三。中华书局，1977年，页12371。

③ [清]国史馆《清史列传》第六十三册，卷六三《已纂未进大臣传》二，页114。

④ [清]翁同龢《瓶庐诗稿》卷五《重题章侯画博古牌刻本次前韵》，《翁同龢诗集》，页149。

时,至于绝粮,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”,以及其批点苏诗时“贫病交迫,朝不谋夕”的困苦境遇深有同感,颇“于我心有戚戚焉”,故此,“翁氏以紫笔过严评,每卷尾俱有题记,有长至一两叶者,一体小行楷,甚精”。但看到自己“然犹有书画数篋,墓庐一区”,又使得他“仰愧先生多矣”,在苏诗批本首册题云:“以紫笔临严思庵先生阅本于此本上。它日当令严氏子孙写藏之。”

翁同龢在虞山批阅苏轼诗集之时,正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(1900),举国动荡。他虽久已退隐林下,闭门思过,平日小心谨慎,不敢稍露形迹,感慨严虞惇“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,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?”却仍然“念及时艰,辄复流涕”^①,心系帝京,未能忘情。“吐露罪臣心事,不少避忌”。其于评本题跋曰:“北方有警,讹言纷然。回望神京,魂神飞越。”不禁发出了“此岂吾读书时耶?然舍读书又何为耶?嗟乎,嗟乎”的慨叹,冀望能被朝廷重新启用。但同时也应该看到,翁同龢并非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,中日甲午海战“于敌势军情焉不识”,却注重派别利益,维护个人权威,“惟一味夸张,力

主开战”,“以致十数年之教育,数千万之海军,覆于旦夕,不得已割地求和”^②,属于书生论政的典型,这在时人的评论中亦有不少记述,如他的同乡曾朴(《孽海花》)、张鸿(《续孽海花》)便曾对其(化名龚和甫)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。翁氏在苏诗题跋中自谓“粗疏任气,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”,“以庸流参大计,以华士谈诗书”,亦曾诗曰:“愧我兢兢作计臣,曾无膏泽及民身。”^③实为的当之反思。况且,他虽有苏轼一样的忠君报国之心怀,却没有苏轼一样的超然旷达之胸襟,在面对仕途坎坷、宦海沉浮时难以坦然处之。他“晚遭谗沮,几获不测,遂斥逐以终”^④,困寓虞山七年之后,光绪三十年(1904)五月,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,便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。不过即使如此,诚如黄裳先生于苏诗识语中所言,翁氏“闻京警而思中朝,其意可伤”,他的苏诗评点题跋,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,清朝士大夫“修齐治平”理想的点滴记载。但其“昌言无忌,不畏抄家致祸,是可异、亦可贵也”^⑤,依然具有文献价值和史学意义。

① [清]国史馆《清史列传》第六十三册,卷六三《已纂未进大臣传》二,页114。

② 参见山谷《翁同龢:维新还是守旧》,《国学》2011年第8期,页56—59。

③ [清]翁同龢《瓶庐诗稿》卷五《三题章侯画博古牌刻本次前韵》,《翁同龢诗集》,页161。

④ [清]赵尔巽《清史稿》卷四三六《列传》二二三,页12371。

⑤ 黄裳《来燕榭读书丛札(续)》,《东方早报》2012年2月12日,第B05版。